

关于《雷蒙·阿隆回忆录》的增补三章

■ 王 甦

《雷蒙·阿隆回忆录》第一版是1983年、也即阿隆去世当年面世的。当时的编辑以篇幅过长为由而选择剔除了“社会主义插曲”、“受到考验的人权”和“走向社会主义霸权”这三章内容。直到2003年,罗伯特·拉封出版社才重新将完整内容集结出版,并请历史学家兼著名报业撰稿人尼古拉·巴弗雷作新序,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版。如果我们观察当年删去的这三章内容,会发现“社会主义插曲”涉及到的是法国政坛的左右派斗争,特别是阿隆对社会党候选人密特朗当选的看法。而“受到考验的人权”则评论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人权外交。最后,“走向社会主义霸权”一章,分析的是当时的冷战形势以及美苏两大阵营的博弈关系。就这些内容本身而言,它们全部可谓是1980年代初期的热门话题。而“热门”或许也代表了“政治敏感”。

要理解这些章节可能涉及的敏感性就必须了解当时法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就法国而言,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出现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失业严重等一系列问题。按照法国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耶的说法,二战后法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黄金三十年”于1974年期间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宣告终结。法国政坛在戴高乐下野及去世后一直为右翼把持,直到1969年底,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才达成了《共同执政纲领》,重新实现了左翼政治联合。1973年议会换届选举中左翼联盟的选情好转,开始成为右翼多数派的政治威胁,最终吉斯卡尔·德斯坦险胜1974年的总统选举。至此,法国政坛出现了戴高乐派、吉斯卡尔派、社会党、法共四大政党争雄、左右两派对立的两

极格局。而1981年密特朗更是代表法国左翼势力第一次赢得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宝座。在大众论调中,密特朗的当选可谓是法国左派的光辉胜利。然而就在左派知识分子和选民都欢欣鼓舞之刻,阿隆却在《回忆录》的“社会主义插曲”一章中,明确指出左翼掌权的局面并不能掩盖其早已发端的内部分裂。他提到了1977年“四月震动”,指出了从两党谈判的表现和各种政治形势中都能察觉的左翼联合破裂倾向。

除了对左翼联盟内部争斗表示担忧外,向来更倾向于左派阵营的阿隆对社会党竞选人密特朗当选总统是否能改变法国现状也相当怀疑,所以他在《回忆录》里将密特朗当政仅仅称作“社会主义插曲”。阿隆的这种态度源于他对密特朗政策的不信任,他质疑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属性而去一味提倡国有化,认为就国际形势而言,密特朗不是“一位适合法国的总统”,因为“他连同他那占了多数的社会主义议员,把我们重新引向的是先前的那些共和国,是一个眼界不出本土的政党,是一种流于辞藻的政策以及对世界的懵懂无知”(《回忆录》增订版,第五部分第三章)。在他看来,密特朗执政的未来七年不过是一场社会主义的实验,而他担忧的是法国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正是这种担忧以及背后的爱国情怀激励阿隆笔耕不辍:“我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就是作为公民、作为爱国者在书写法国,我觉得法国处于将死的危难中。”更确切而言,他的着眼点并非左翼的未来或左右派争斗的结果,而是担心因此导致的左右派争斗这种局面本身。而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左右两极格局形成之初预感到的这些有关分裂



《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版
[法]雷蒙·阿隆著
杨祖功 王 甦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内耗和轮流执政的弊端,到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似乎成为了法国选民心中普遍认为必须要面对且解决的政治问题。因此,我们才能看到2017年总统大选中传统左右党派纷纷失利,而以宣称摒弃左右党派界限的马克龙获胜。

冷战的政治格局对阿隆的影响是深刻的。而“走向社会主义霸权”一章涉及的正是阿隆对社会主义全球形势和美苏冷战前景的分析。阿隆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很多分析研究苏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文章。而在第一版《回忆录》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章里他也花了很多笔墨去分析萨特、梅洛-庞蒂、勒福等重要知识分子的观点,以重申自己的立场和说明这本书的重要意义。

即便有了“知识分子的鸦片”这章的存在,《回忆录》初版将“走向社会主义霸权”的内容删掉,也依然是令人遗憾之举,因为与“知识分子的鸦片”一章不同,这是阿隆在全书唯一一处集中论述他对社会主义全球前景看法之处。身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人们很

难预见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分裂,因此两大阵营的此消彼长依然是当时最重要的热点话题。而对于写出了国际关系巨著《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力图理解国家间合作和对峙基本原理的阿隆而言,这些有关国际形势的分析对其自身的学术生命也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阿隆曾在讨论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态度时提到,就冷战背景下的国际关系而言,“真正的现实主义是承认意识形态对外交-战略行为有影响……如果不去认识一个国家的政体,如果不去研究执政者秉持的哲学,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国家的外交-战略行为。”而在他看来,这点对于西方理解苏联而言似乎特别关键。秉持这一思路,在“走向社会主义霸权”这一章节里,阿隆分析了苏联执政者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而冒进的可能以及直到当时一直秉持的审慎态度,同时通过对比两大阵营在全球的博弈分析了“社会主义霸权”这一说法的现实性。如果真如阿隆所言,即便处于西方阵营却依然力争客观分析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劣势的阿隆言论的确会对那些一味想要夸大社会主义霸权和威胁的论调(比如M·卢勒)形成批判的话,那么《回忆录》出版时被删减的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的章节或许真的触及到了当时法国知识界的敏感点。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和评判四十多年前的阿隆的主张,作为政论家,他写作的内容不但是一种历史参考,也是一种敢于评论时事的勇气表现。《回忆录》增订版对这一章节收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完整的阿隆。

与评论苏维埃阵营相对的另一敏感话题就是评论西方,特别是美国国际政策的功过。而被删去的“受到考验的人权”涉及

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人权外交是卡特执政期间为美国制定的对外政策基调,它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领域可谓影响深远。直到现在,人权问题和有关人权外交的政治问题都依然是国际关系领域一个无法避免的方面。作为西方阵营领头人的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做法,在处于美国保护之下的当时的西欧世界引起了热烈反应。阿隆却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回忆录》的“受到考验的人权”一章中对这一政策大泼冷水,从根本上揭露了人权外交的伪善性。在他看来,道德主义色彩明确的人权外交与美国的现实主义政治(也即“民族利益”)之间必然冲突。阿隆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权外交不可能做到不计行为发生地、政权性质和政权之间的联合关系而对所有违背人权的行为都一并揭露,因此人权外交的道德主义诉求根本就与政权利益和冷战二元形势下的外交需求矛盾。无论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美国推行人权外交和法国是否跟随的问题做出了怎样热火朝天的讨论,阿隆都是最冷静的人之一。他提醒对国家道德和现实国际关系抱有道德主义幻想的人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国家间的利益现实和冷战对立的局势。

尽管初版删减上述三章的真正原因已不可考,但作为三章内容的中文译者,我深感此次完整版面世的重要性。由于参与了阿隆的《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一书的翻译工作,对于《回忆录》的后两章翻译,比较得心应手。而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插曲”一章的翻译质量,我查阅了不少资料,以了解当年法国左右派政治斗争的形势。对于一个旅法学者而言,这对我了解法国社会的历史不无裨益。写下这篇译后记,期望借此帮助《回忆录》增订版的读者们更加了解作者写下这三章内容时候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同时也期望再次传达出贯穿阿隆整部回忆录的那种知识分子心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精神。

“文学回忆录”丛书:四十年来“立此存照”

■ 陈思和



“文学回忆录”丛书
张炜 残雪 蒋子龙等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思想意识形态的理论斗争处于白热化状态。我那时刚刚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不久,同班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一下子触动了全社会痛定思痛的神经,于是“伤痕文学”引起风潮。理论界还在那里忙着讨论什么“歌颂”还是“暴露”、“社会主义体制下会不会产生悲剧”等等夹缠不清的话题时,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呼啦一下通过了这部作品,由此开启了被称作“新时期文学”的方向。差不多在同时间,思想解放运动中诞生了《今天》等一批民刊,被称作(尽管不很确切)“朦胧诗”的新诗潮流开始在青年读者中广为传诵,尽管引起了争论,但是“新的美学原则”由此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改变了诗歌创作的途径。1985年,一批知青作家尝试从民间民俗文化描写入手,融汇传统审美特点与西方现代主义手法,以此改变文学与政治紧密捆绑的写作观念,兴起了蓬蓬勃勃的“寻根文学”,这一创作思潮对1990年代作家们转向民间、坚持写实和人文理想,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一晃,四十年弹指一挥间。这四十年

来,虽然道路走得曲曲折折,但国家领导层面基本上遵守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不搞阶级斗争、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等承诺,经济建设带来国家的强盛,大国和平崛起的赞声不断出现。这个时候,我常常想起地球上的另一块土地,欧洲欧罗巴,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殖民政策给宗主国带来了广阔市场,国内经济发达,物质繁荣,人们陶醉在纸醉金迷的欲望追求之中,文学上流行了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等声色犬马的世纪末思潮。就在三十年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出了《贝多芬传》,大声疾呼人类精神的追求。再过了差不多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突兀爆发,又是罗兰发表了“在混乱之上”的精神宣言,强调在国别以上,应该追求人类共同的精神。作家在国人与敌人的咒骂声中获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咒骂他的人们,却在战争废墟上不得不收拾残瓦一片了。

文学是社会的良知,是人类历史的见证。文学在一个时期内可能会被误解、被咒骂甚至被威胁、被迫害,但是优秀文学的真正力量,仍然在于无伪地揭示真相,肯定真善美的理想,让人性中的虚伪、凶残、血腥、无耻都感到了颤栗与无趣。记得很多年以前,无意中看了一部电视剧,剧中汉景帝对晁错说,老师啊,你告诉过我,对的事情总是对的,错的事情总是错的。可是,为什么现在明明对的事情却变成了错的?错的东西倒好像变成对的了?于是晁错被杀了,在临刑前,晁错对汉景帝说:皇上,我还要说,对的,到最后还是对的,错的,到最后总是错的。我想,两千年以前的对和错,现在已经一点也不重要了。但这样一种坚信自己是“对的”的理想,只有

在文学作品里,才会被描写得那么生动,那么有生命力。这就是文学的不朽所在。

广东人民出版社在推出著名作家“非虚构文丛”的同时,又推出这套“文学回忆录”系列,意在为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收录当代作家有关文学创作的回忆与反思,以及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对人生、社会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选题,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和人的历史,将在这里“立此存照”,给当下一个见证,给未来一份信史。